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晚清外交使节文选译

● 雷 广 臻 ●



巴蜀书社



晚清外交使节文选译

（清）薛福成、马建忠、邵友濂、薛福成、马建忠、邵友濂



晚清外交使节文选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晚清外交使节文选译

雷 广 臻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侯跃生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晚清外交使节文选译

雷广臻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芒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鸷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在 1840 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中，中华帝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从此，封建的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再也无法继续，古老的中国被迫进入国际社会，不能不同曾经被视为“夷狄”的西方国家打交道、办交涉、通往来。

中国进入近代国际社会的过程，充满了痛苦和屈辱。从 1842 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起，西方侵略者接踵而来，门户是洞开了，而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却不断地蒙受损害和凌辱。中国的近代外交，就是在这种备受屈辱的过程中开始的。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可说是一部屈辱史。这种状况，从晚清到民国，百年来虽然历经中国人民长期不懈的斗争，曾经有所改变，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彻底结束。

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平等地互派使节，本来是外交事务中正常而不可或缺的。所谓互派，一是来，一是往。而中国与

西方列强间的这种外交往来，从一开始就带有畸形的状态。英国首任驻华公使璞鼎查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来到中国的。这个气焰嚣张的侵略分子不但指挥英军烧杀抢掠，而且是压迫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国全权代表。美国、法国的首任驻华公使顾盛和刺萼尼的使命，同样是压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他们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的签字人。最先来到中国的外国公使当时还不能驻进北京。外国公使驻京，则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大炮迫使清朝政府接受的。这是炮口下的外交，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妥协屈服的产物。

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使节，比列强派来公使晚了二十多年。1867年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使节还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蒲安臣，一个刚刚御任的美国驻华公使。1870年第二个奉派出使的是三口通京大臣崇厚，其使命则是为“天津教案”到法国“赔礼道歉”。这两次派出的使节，还都不是常驻所在国的使节，到了1875年，因为发生了“马嘉理案”，英国借此兴风作浪，乘机要挟，清朝政府为了结此案，“通好谢罪”，才在这一年8月，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这是中国正式派出的首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近代派出的第一个驻外使节。此时，已经是19世纪70年代，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35年。曾经长期沉缅于“万国来朝”的清朝统治者早已失去昔日盛世的辉煌。中国所面对的已经是帝国主义角逐世界市场，争霸世界和分割世界的险恶局面。在西方侵略者心目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享有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而是可以任意欺凌和宰割的对象。在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之间，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已经不是平等的国际交往了。

从 1875 年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起，到 1912 年清帝逊位前止，清朝政府共向 17 个国家先后派出驻外使节正使 58 人、副使 4 人。他们在出使期间所写的奏疏、函电，以及家书、日记、诗词文章等，是研究和了解晚清外交的重要文献资料。由于数量很大，卷帙浩繁，即使专门的研究者，要一一阅读，也极不容易。所以，我们从中选出一小部分，加以译注，编成这本小册子，以便大家选读。文章共 30 篇，作者是曾经担任过正使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杨儒、黎庶昌和张德彝。这些文章，有的记录了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斗争，反映了作者爱国主义的精神；有的反映了海外华侨在异国他乡的血泪艰辛，以及作者为保护华侨所作的努力；还有的则是作者任职期间的见闻笔记，其中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文采飞溢的散文名篇。总之，读者可以从不同侧面，从点滴之中去窥视和了解当时的中国与世界。虽然这有限的篇章远非其全貌，而只是零散的片断。

在上述六位作者中，以驻外使节身份最早跨出国门的是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又号玉池老人，晚年自题书房为“养知书屋”，人又称其为“养知先生”。他 17 岁入学，19 岁中举，29 岁成进士、庶吉士。1857 年 39 岁时，任翰林院编修，次年入值南书房。科举之途，应当说是很顺意的了。

他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时，得识曾国藩、刘蓉，结为知己。以后又为李鸿章、文祥等洋务大员赏识推重。在洋务集团中，被认为是“文章学问，世之凤麟”的人才。然而，在政治上，他却是坎坎坷坷，很不顺意。1859 年，他奉派协助僧格林

沁办天津海防，赴山东巡视海关，两人意见相左，竟遭降职处分。1863年，署广东巡抚，又因与总督不合，被罢了官，成了个“赋闲三品”。1874年才又奉召入京，第二年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旋被派为出使英国大臣。这是他所担任的最重要职位。任职期间，他很注意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考察，表现出勇于向西方学习，寻求新知的热情。然而也因此使他成为封建顽固分子攻击的对象。出使期间所写的《使西纪程》，被攻击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连遭参劾，终被毁板。驻英副使刘锡鸿，更是构陷诬攻，无所不用其极，不但加诸“藐玩朝廷”的罪名，甚至视之为“汉奸”。终至迫使他不得不奏请销差，任期未滿便束装回国，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此后，他便称病乞休，闲居乡里，晚景凄凉，寂寂而终。

郭嵩焘著述很多，大多散佚，今存有《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养知书屋遗集》等。

继郭嵩焘出任驻英兼驻法大臣的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生于1839年，是曾国藩的长子，“少负隽才”，受其父影响很深，曾国藩死后，他承袭其父侯爵，因而人又称之为侯爷或曾袭侯。1880年，使俄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订《里瓦几亚条约》，被革职定罪，曾纪泽奉派兼任驻俄大臣，与俄国谈判改订条约。从1878年到1885年，他在使英、法、俄任上共八年之久。任期中最重要的建树就是为收回伊犁与俄国的改约谈判。谈判历时半年多。他坚持爱国立场，据理力争，极尽艰难曲折，终于取消了崇厚所订旧约，重订新约，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曾纪泽所订新约虽然还保留了旧约中许多不平等规定，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史上，曾

纪泽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斗争及其成绩，功不可没，是应当肯定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积极主张备战，主张抵抗。在与法国的谈判中，态度强硬。但当时国内当局者怯懦无能，一味妥协，他深感“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十分愤慨。1884年4月，当李鸿章即将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时，曾纪泽被视为谈判障碍，被免去了驻法大臣的兼职。1885年7月曾纪泽由驻英使臣任上奉召回国。回国后，曾纪泽历任帮办海军事务、户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1890年去世，年五十一岁。

曾纪泽生前的著作收入《曾惠敏公遗集》（曾死后谥“惠敏”，故称曾惠敏公），计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即《使西日记》），共十七卷。

薛福成是与曾纪泽齐名的清季外交官。钱基博写《薛福成传》曾说：“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薛福成是江苏无锡人，字叔耘，号庸龢，1838年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祖父是一个穷秀才。父亲薛湘靠教书养家，后来中了进士，在镇江任府学教授，后任湖南新宁知县。薛福成7岁入私塾，21岁中秀才，但到29岁应乡试，只得中副贡，科场很不得志。他读书很勤奋，重经世致用之学。1864年起入曾国藩幕，1875年又入李鸿章幕。幕府生涯前后达十四年，很受曾、李的赏识。1884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积极筹备海防，并参与击退进犯镇海的法国侵略军。1889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大臣。出使期间，在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保护华侨利益等方面多有建树。例如与英国反复谈

判，于1894年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收回了云南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划定了昔马地区三万平方英里及穆雷江南既阳江东约七八十平方英里的地界为中国所有。又如为保护华侨利益，与英国多次谈判，取得了在英属南洋各埠添派领事的权利。他还奏请清朝政府废除了以往限制、歧视和迫害归侨的禁令。我们从薛福成《出使奏疏》中选注了4篇，读者可以看到他在外交工作中作出的努力和成绩。出使期间，薛福成还写有《出使日记》、《日记续刻》共16卷。内容十分丰富，记所见所闻，有论有析，不少篇章都颇有深度，文字又十分简练精美。其中如记在巴黎参观蜡人馆油画院，更是广为流传的散文名篇。

薛福成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写于1879年《筹洋刍议》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薛福成反抗侵略，要求改革，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其中不少是论述有关外交问题的，我们从中选出《约章》一篇，以飨读者。

1893年，薛福成任满回国。1894年春回到上海后，不幸患病猝逝，年五十七岁。生前著述颇丰，《庸盦全集》收有《庸盦文编》、《庸盦文续编》、《庸盦文外编》、《海外文编》、《出使奏疏》、《出使公牍》、《浙东筹防录》、《筹洋刍议》、《出使日记》、《日记续刻》等十种，共四十四卷。此外还有《庸盦笔记》六卷。

杨儒是晚清又一位著名的爱国外交家，字子通，号迺庵，汉军正红旗人。其生年不详，1861年以监生捐员外郎，1867年中举人，曾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道员，1892年奉派为出使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大臣，1896年调出使俄国兼奥地利、荷兰大臣，前后出使十年，1902年病逝于俄京任所。

杨儒出使俄国期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沙俄帝国主义出动十几万大军占据东北三省。1901年清朝政府与列强议和开始后，俄国为永远霸占东三省，又单独派代表胁迫东三省中国地方官员谈判，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并议订所谓《俄国政府管理满洲之原则》，表面上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实际上将东三省完全置于俄国的占领管辖之下，成为俄国的独占殖民地。1901年1月，杨儒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交收东三省问题。内无定见，强敌外逼，谈判是在极为艰难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杨儒揭露了《暂且章程》的非法性，坚持“暂章”“不能作数”，拒绝承认，终于迫使俄国不能不废除《暂且章程》，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但斗争并未结束，在俄国提出的正约约稿中，不但保留了独占东三省的侵略要求，而且扩大到蒙古等地区。尽管俄国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压迫，杨儒对这一贪婪无理的侵略要求始终坚决予以拒绝。但李鸿章在俄国压力下，却电示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军机处也电杨“全权定计，朝廷不为遥制”。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下，杨儒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坚持“未奉画押之旨，不敢擅专”，毅然抗命拒绝签字。在1901年3月24日他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第七次谈判中，不为维特的威胁利诱所动，明确表示“捐躯报国，是臣工分内之事”，没有画押全权，绝不签字。维特又许诺，只要杨儒签了字，清朝政府“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来保护”。杨儒义正词严地指斥说：“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真是宁折不屈，铁骨铮铮，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第二天（3月25日）杨儒与俄国外部大臣拉姆斯多夫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忧愤交

加，回到使署下车时，因天寒雨雪，滑坠坠地，从此一病不起。1902年2月19日，这位爱国外交家与世长辞。

我们所选文章的另一位作者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又做过江苏吴江、青浦知县。1876年，他以三等参赞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是晚清最早派出的驻外使署官员之一。1877年调驻德参赞，次年又调驻法参赞，1879年仍以参赞调驻西班牙。1880年起任出使日本大臣，其间因丁母忧曾回国。1887年又回任出使日本大臣，至1890年任满回国。

黎庶昌在外交上重要建树不多。他早年曾师从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郑珍，在曾国藩幕中六年，深得曾之器重，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颇有文名。文宗桐城，其著作有《拙尊园丛稿》六卷。在出使日本期间，曾搜集我国已佚古书三十种，编辑成《古逸丛书》。又曾编《续古文辞类纂》计二十八卷。在驻英、德、法、西班牙期间，曾写了《西洋杂志》一书，记载了他旅欧四年中的见闻杂记，以及有关书简和三篇地志。我们从中选出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记述了1878年德皇威廉一世两次遇刺事件，并就此事件谈到了当时欧洲工人阶级方兴未艾的社会革命运动，使用了“索昔阿利司脱”（即 Socialist）一词，对社会主义作了作者当时所能理解的解释和议论。这可能算得上是中国学者最早谈及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观察新事物的敏锐性。

张德彝（1847—1918），汉军镶黄旗人，本名德明，字在初，1862年15岁时入北京同文馆学英文，是中国第一所外文学堂的毕业生。1866年他随清朝政府第一次派遣出洋“游历”的斌椿，

出访法、英、比、俄等欧洲十国；1868年，又作为翻译，随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使团——“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1870年，崇厚奉派到法国“赔礼道歉”，他任随行翻译。此后，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1878年调随崇厚出使俄国，1887年又调随洪钧出使德国，均任翻译。1890年回国后，在总理衙门任英文翻译，并一度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1896年到1900年随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任参赞。1901年起，出任驻英兼驻意、比大臣。他先后八次出国，每次都写有一部日记，名《航海述奇》，依次为再、三、四、五、六、七、八“述奇”。除《七述奇》一部稿佚未见外，余均存世。

张德彝任出使大臣较晚，建树不多。但他从1868年任蒲安臣使团翻译起，到1905年由出使英国大臣任上回国止，在国外累计度过二十多个春秋，可称得上晚清资深的外交人员了。他留下的日记，洋洋洒洒，百余万字，蔚为大观，被誉为晚清一大游记作家是不过分的。当然，他的日记也并非只限于山川形势、风土人情之类游历记述。沿着日记，也就是他的“述奇”之作的足迹，可透视出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侧面。在《三述奇》，即《随使法国记》中，他以一个亲身目击者，记录了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从起义爆发，到公社成立以及最后失败的全过程。其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有作者从封建正统观念去审视这一伟大革命的痕迹，但从整体的记述，以至某些细节的描写，人名地名的记载，都可以说是真实而客观的，是一部关于巴黎公社革命极为珍贵的信史，很值得一读。

选编工作虽然尽我们的主观努力完成了，然而我们却没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在编选过程中，我们虽力求做到编选得当，